

新商科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可持续发展^{*}

姚银花 熊 乐

(西安欧亚学院 陕西西安 710000)

摘要: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转型,国家战略的实现和新经济的快速发展,新型商科国际化人才的需求尤为迫切。以新经济、新产业为背景的“新商科”建设对高校的大商科教育改革和人才培养提出新的要求。本研究基于国内外商科人才培养现状,聚焦商科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可持续发展提出:基于中国国情,在商科教学中融入聚焦中国文化的课程思政案例设计;课程培养方案聚焦“创新创业”的通识可迁移能力培养;基于结果导向理论,引入国际认证标准。新商科的可持续化发展需要打破传统商科人才培养的模式中的专业壁垒,重视中国文化的传播和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深度融合;以结果为导向,关注学生的国际化发展和心智的成长。

关键词:新商科 国际化人才培养 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218/j.issn.2095-4743.2023.01.119

引言

随着数字化经济的快速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高科技技术手段不断被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商业运作模式在不断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组织结构、商业形态及管理模式也在创新和发展中迭代。新的商业模式不断应运而生,这使得传统商科人才培养模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高速发展的信息经济时代使得未来的商业形态及运作模式充满着多种不确定性,那么,高校商科国际化人才培养如何适应这种不确定性呢?笔者认为,商科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可持续发展与创新应是应对不确定性的主要策略之一。

一、“新商科”的概念界定

商科属社会科学范畴,主要包含经济和管理两大类学科,涉及多个不同的商科专业群,在我国新文科课程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教育部公布的最新数据:2012-2020年中国经济类专业群数同比增长了50%,其发展速度之快已远远超越其他文科专业群。这表明商科建设在整个新文科建设中的地位不容忽视。

商科研究的专家学者一致认为,传统工业时代发展至今的商科教育模式早已经无法满足及适应数字经济的发展,商科教育的创新改革势在必行。传统商科教育是基于亚当斯密分工理论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其人才培养主要以就业为导向,教学内容注重专业理论。在网络数字经济时代,由于传

统商科人才培养模式暴露出的种种弊端,“新商科”便被教育界专家学者适时提出来了。

2018年,高等院校新商科建设与国际化联盟成立大会上,中央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书记葛建新提出:新商科的发展不能否认商科过去多年的发展,要在此基础上去积极回应数字经济时代科技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新挑战。2019年3月,教育部高等学校工商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上海召开,主要探讨了“新商科”的概念、内涵和实践路径,并对新商科教育未来的发展趋势和人才需求等进行了深入研讨。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齐佳音教授主张新商科要通过构建新的思维、新的规则、新的理论及新的工具去更新商科学生的知识构成。席酉民认为新商科要走出专业壁垒,就需要进一步融入其他学科中,这也将会是新商科未来发展的必然路径。然而,“新商科”自提出到现在,其确切的概念内涵仍没有达成广泛意义上的共识,还需进一步讨论与研究。

综上所述,对比与传统的商科教育,新商科已经渐渐走出了单一的专业发展路径,重视与其他学科群的跨学科融合,注重商科人才数字经济思维的训练和新的技术手段的学习与实践应用,使新商科人才培养适应产业的飞速发展。

新商科是传统商科的再发展,是在商业模式、数字技术和人文艺术深层融合发展的数字经济时代,对已有商科的教育观念、课程建设与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改革与创新。新商科

*基金项目: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新文科背景下西安国际化人才培养与评价研究”(项目编号2022HZ0867)。

应突出学生国际化的培养，拓宽专业发展口径，实现新商科人才培养的可持续发展，服务国家及地区发展战略。

二、商科人才培养研究综述

1. 国内商科人才培养现状

国内学者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对商科人才培养进行探讨。宏观上，关注新商科人才培养的顶层设计、商科课程体系建设、协同培养方案及可行性等方面（宜昌勇，晏维龙，2020）；其次，还有少数研究聚焦新商科的内涵。微观上，探索商科人才培养的模式及实现路径（苑梅，朱璋龙，2021；张国平，2021）。

宜昌勇、晏维龙在《“四跨”融合培养新商科本科人才》一文中提出了旨在满足商科人才在知识、能力、素质方面的新要求，构建“跨学科”知识体系、线上线下“跨域”融合的“教”与“学”新模式、产教融合的“跨界”资源共享方式，以及境内境外双向交流的“跨境”合作模式的“四跨”新商科本科人才的培养方案。除了跨学科理念外，学科交叉与融合也是学者们的关注点，如有学者提出了“三维交叉、四度融合”的商科人才培养路径，实现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之间、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科学研究与高新技术之间的交叉融合，重构人才培养体系。武汉商学院提出的动态“特色课程群”可作为应用性商科院校通识课程体系构建的基本形式。

国内很多高校学者还就新商科内涵进行研究。有学者指出，应用型本科院校要全面把握“新商科”建设的内涵与实质，围绕和聚焦人才培养的创新发展，进一步构建中国特色商科新理论和新模式，坚持走个性化人才培养发展之路，健全面向质量提升的“跨界融合”商科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商科人才培养的微观研究上，苑梅、朱璋龙在《新商科人才培养的基本特征与路径优化研究》中提出新商科人才培养应具备数字与智慧有机融合、新商科思维和数字化技术融合、产业与教育协同育人、培养目标与“四链融合”跨学科协同一致等新特色。因此，需要进一步优化新商科人才培养的路径，创建商科特色专业群，围绕专业所需核心技能创新商科实践教学体系，设置跨学科的新型商科人才培养课程模块体系，采取“工学结合双元育人”的新型商科人才培养模式，组建具有“双师”能力的新商科人才培养师资团队，培养受企业欢迎并能够适应新商业发展的新商科人才。张国平在《新商科人才培养模式与实现路径》中提出商科院校要不断反思和改革商科人才培养模式，重构聚焦“商科、技术、思维”的课程体系，培养建立满足新商科人才培养要求的师资团队，创新商科教学实践体系，优化新商科人才培养的质

量保障评价体系。

综上，目前，国内商科人才培养研究数量呈不断增长的趋势，但实证研究不足，重复性研究居多，尤其是新商科国际化人才培养可持续化发展还有待拓展。

2. 国外商科人才培养启示

国外商科人才培养研究主要聚焦于商科课程设置研究、培养模式研究及商科认证研究。

早些年，吕一林教授在《国内外商学院课程结构与设置的比较研究》中介绍了美英等一流商学院的课程设置情况，对我国创建一流商学院出一些建议：设立模块化的课程结构，加强基础课，注重文理渗透及广开选修课。张昊民在《麻省理工学院创业教育生态系统成功要素及其启示》中聚焦麻省理工学院的创业教育系统的成功要素，即系统化思考、系统化学习、系统化教育、系统化运作、系统化实践及系统化提升，提出如何将国外先进经验与我国国情相结合，探索中国特色创业教育模式。

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国际认证已受到商科教育界的重视，部分国内商科院校把拥有国际认证作为提高院校竞争力及品牌效应的一种重要路径。Sabine Kohlsaat在《国际化发展战略视野下商科专业认证问题研究》提出获得商科质量认证将有助于高校在国际教育市场上提高知名度。庄丽君在《美国商学院促进协会的商科认证研究》中指出中国商学院在商科教育改革的进程中，首先要基于各自不同的院校特点确立自己鲜明的愿景，并基于此愿景建设聚焦学生学习效果评价的商科学院内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系统规划和科学推进实践型教学团队建设。

国内已经有部分商学院聚焦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下应用型商科人才培养，提出以国际认证标准来指导人才培养的策略。国外商学院人才培养研究表明，国外商学院关注商科人才培养的综合性、系统性，与标准性。这对商科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可持续化发展至关重要。

三、商科人才可持续化发展

1. 基于中国国情，融入聚焦中国文化的商业案例设计

十九世纪末，商科教育在美国兴起，二战后进入了高速发展期。欧洲的商科教育也不例外。与欧美国家的商科教育相比，我国现代商科教育发展比较滞后，一直以来在学习和借鉴国外的商科教育理论和教育模式。

2014年，课程思政概念被提出；2020年5月，教育部发布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要求各高校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商科作为高等教育重要组成部分，承担为地

方及国家经济发展输送合格人才，服务国家地区发展战略的使命。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加之我国的具体国情，要求高等商科人才培养着力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传播中国故事与中国智慧；在强调与国际接轨的同时，必须立足中国国情，基于中国文化，设计并采用中国商业案例开展教学活动，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的商科理论去解释中国现象、解决中国问题、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践，向世界传播中国的声音。

2. 聚焦“创新创业”的通识可迁移能力培养

通识教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自由教育或博雅教育，其目的在于培养积极参与社会生活、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全面发展的国家公民。目前，在我国，通识教育是高等教育的很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识教育所关注的通识能力同时也是学生“双创”所需的核心能力。

随着通识教育在我国近些年的不断发展，通识教育的多元化内涵及其重要性也已经得到了我国高等教育界专家学者及部分老师和学生的高度认可。商科作为实践性较强的应用型学科群，其人才培养目标中越来越重视通识教育的基础性作用，国内外各大商学院都有自己的特色的通识课程体系，由此可以看出，通识教育对于国际化商科人才培养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沃顿商学院课程体系World, future, you模块中的《探索自己与社会》《艺术与人生》《结构化思维》和《国际道德》课程表明商科人才培养能力中除专业能力外、使用文字和口头的表达与交流能力、分析及解决问题所需的思维能力、团队合作能力、适应多元文化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自我反思能力、艺术审美能力及道德素养是重要的通识可迁移能力。这种通识可迁移能力也是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

通识可迁移能力的培养必须依靠系统的商科通识课程体系来最大化实现。打破传统商科课程体系，构建以能力为导向的多学科交叉融合高度系统化课程体系是培养通识可迁移能力的途径。教学设计基于“以学生为中心”，采用线上线下和理论与实践双轨模式并行。此处的多学科交叉一是打破商科内部各专业学科壁垒，形成如会计学、管理学、经济学、统计学和金融学等的相融合的“大商科”；二是指商科与工科与文科的融合。这也是国家“新文科”建设的要求。

3. 基于结果导向理论，以国际认证标准指导商科国际人才培养

Outcome Based Education，简称OBE理念是在学习产出理念的基础上提出的。OBE理念重视学习效果的产出，强调以教学效果为导向去进行教学设计和教学评价。

随着国际化的不断推进，高等教育也不断地向国际化迈进。这就意味着高等教育在发展过程中要遵循国际化标准与原则。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评估也变得越来越受到重视。2011年国家在《教育部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评估工作的意见》中，从政策上确立了“五位一体”的本科教学评估制度。政策当中提出了国际评估这一重要的标准和手段。这一政策也表明国家鼓励高校开展国际化评估。在此政策的推进下，中国高校也自主开展了国际评估，积极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特色且被国际认可的权威机构或组织进行商科的专业认证与课程评估。这种专业认证与评估的过程就是商科院校学习行业国际标准推进课程高质量发展的过程，对于建设世界一流商科专业，提升商科教学实践，培养社会需要的高层次国际化商科人才，提高我国商科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办学水平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商科国际认证既是一个商科教育质量的评估过程，也是一个商科教育依照国际化标准发展的过程。国际认证着眼于教学过程的产出，以结果为导向、重视教师参与评估体系，是新商科国际化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路径。

结语

新商科是商科教育在新经济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新商科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与国家时代发展紧密相连、相辅相成。新商科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必会推动时代的发展，同时时代发展又对商科人才培养、知识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新商科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可持续化发展与创新需要立足现代中国国情，设计中国的商业案例、聚焦培养“创新创业”所需的通识可迁移能力培养、基于结果导向理论，以国际认证标准来指导商科国际人才培养。综上所述，新商科的发展需聚焦未来国际商科人才所需的知识、能力与素养，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服务国家发展战略。

参考文献

- [1]Sabine Kohlsaat.国际化发展战略视野下商科专业认证问题研究[J].应用型高等教育研究,2021(2):73.
- [2]宣昌勇,晏维龙.“四跨”融合培养新商科本科人才[J].中国高等教育,2020(3):51.
- [3]苑梅,朱璋龙.新商科人才培养的基本特征与路径优化研究[J].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J].2021(5):35.
- [4]张国平.新商科人才培养模式与实现路径[J].中国高等教育,2021(2):43.
- [5]庄丽君.美国商学院促进协会的商科认证研究[J].高教发展与评估,2019(2):93.